

● 杨建宏 著

农耕与中国传统文化



湖南人民出版社

农耕与中国传统文化

● 杨建宏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平
装帧设计:肖前一

农耕与中国传统文化

杨建宏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66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科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125

字数:198,000 印张:3,000

ISBN7-5438-3508-8

K·675 定价:18.80元

前 言

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存的需要，为此我们必须吃饭、穿衣。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民以食为天，食物可以是野生的动植物，但这只能满足人们最原始的物质需要，况且野生的动植物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随着人类数量的不断增长和生存质量的不断提高，一种能持续提供食物来源的生产机制必须产生，正是这种对食物的需求和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双重刺激，促使了古老农业的诞生。

中国地处北半球，亚欧大陆的东部，东临太平洋，北隔茫茫大沙漠，西阻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西南有不可逾越的喜马拉雅山，南临南海，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个地理单元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一年四季分明，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便于农作物的成熟。而且中国境内，河网密布，长江、黄河都是世界有名的大江大河，河流给农业带来了灌溉的便利，也给下游冲积平原带来了肥沃的土壤，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我们的祖先别无选择地走上了农耕之路。也由于这样封闭的自然环境使中国古代农业在其发展初期走上独立发展的路子。

中国农耕历史悠久，大约一万年前的母系氏族繁荣时代，便开始了农耕，伏羲氏和神农氏是中国最早的农业英雄。此后中国农业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的初步发展，秦汉到隋统一前的繁荣和迂回前进，唐以后，中国农业重心由黄河流域向江南转移，江南成为中国衣食租税的主要来源。

在漫长的农业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文化是“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①此所谓“共业”包括众多的领域，诸如认识的、艺术的、器用的、社会的等等。对这些复杂的领域我们一般将其解构为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人针对自然而产生的物质文化，针对社会而产生的制度文化和针对于人类自身而产生的精神文化。中国农耕文化也可作如是分解。

在中国农耕发展中，为了利用不多的土地，我们的祖先向山要地，向水进军，向边境拓殖，开垦了大片的良田。为了农业用水的需要，古人想方设法利用水源，在利用江河湖海等地表水和发掘地下水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古人不断发明和创造农业工具，形成了适合北方旱地和南方水田需要的系列农具。为了改善食物结构，古人培植了数量众多的粮食、蔬菜、瓜果，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需要。所有这一切构成农耕文化的物质基础。

古代农民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创造农业物质文明的。同一姓氏有着血缘关系的农家组成强大的宗族，宗族聚族而居，形成一个个社会经济区，在社区内族长形同最高行政长官，对族人实行着各种封建统治，同时在区内提倡患难相恤，水火相救，使残酷的宗族统治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成千上万的农业家庭组成大大小小的宗族，各宗族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下形成国家，古代国家以农立国，历代统治者特别注意加强农业管理。他们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以保护农业生产，同时完善农业赋税制度和土地制度，这些构成了中国农耕文化的制度层面的内容。

古代农业民族有着自己独有的精神生活方式，在宗教信仰方面，古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建构了一个多神崇拜的神灵系统；在政治信仰方面，古人相信皇权至上，所谓“率土之滨，莫

^①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学灯》1922年12月9日。

非王臣”，“天无二日，家无二尊”，便是这种信仰的反映。农业社会里的人们在道德信仰上崇尚忠孝仁义和三纲五常。哲学信仰上相信天人合一和历史循环。在农业生活中，农民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形诸歌谣、神话、传说和各种民间艺术，而历史上的一些文人墨客也把农耕生活写进诗篇，绘到画中，形于园林，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山水田园诗、山水画和山水园林，共同建构农耕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的农耕理想乐园。与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不同，农业思想家、科学家们则着意于总结农业经验，探索农业规律，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农学著作，成为古代社会良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社会风俗方面，由于农耕生产对季节的要求十分严格，古人对于天文历象认识特别深刻，他们设定了各种农事节日。此外，在宗教节日，庆贺节日，纪念节日里，农家总是举行各种活动祈求农业的丰收，农耕民族的婚嫁、饮食、风水、丧葬等都打上重重的农耕印记。凡此种种，都构成中国农耕文化的精神层面的内容。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中国正由一个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化，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完成这一转化必须以高科技为先导，以市场机制为资源配置调节器，以科学管理为理论指导，而传统的农耕却是排斥科学的、排斥市场的、封闭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在这一划时代的变革面前，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有没有自己的出路，如果有的话，出路将在何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每个有责任感、良心感的中国人都应该关注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社会无论怎样发展变化，人类衣食问题始终是要解决的，这决定了农业在未来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的不可动摇性，因此，传统农耕文化便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21世纪应该是一个科学和民主的时代，更应该是一个人类自身素质不断完善的时代，是一个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时代。而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中对人类自身的关怀和天人合一的观

念，正是这个时代的要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剔除传统农耕文化中愚昧与专制的糟粕，继承现代工商文化中科学与民主的精华，使中国农耕文化与现代工商文化相互融通将是中国农耕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目 录

- 前 言..... (1)
- 第一章 农史——农耕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1)
- 一、从伏羲到后稷的传说..... (1)
- 二、夏商周三代农耕的发展..... (5)
- 三、中国农耕文化的繁荣—秦汉到隋统一以前..... (8)
- 四、隋唐至明清：农耕重心的南迁..... (11)
- 第二章 农艺——农耕文化的物质基础..... (15)
- 一、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结构..... (15)
- 二、食以地为本：农业土地的垦殖与利用..... (34)
- 三、生命之源的关注：农田水利建设..... (40)
- 四、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农业生产工具的演进..... (51)
- 第三章 宗族——农耕文化主体的生息环境..... (60)
- 一、宗法：农耕社会里的脉脉温情..... (60)
- 二、宗族：聚族而居的大家庭..... (63)
- 三、宗谱：联系同一血缘的纽带..... (66)
- 四、宗祠：宗族的精神寄托之所..... (68)
- 五、民居：因地制宜，各有千秋..... (71)

第四章 农政——农耕文化的制度保障 ·····	(78)
一、农本商末：重农思想与实践·····	(78)
二、不患寡而患不均：农业赋税制度·····	(85)
三、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农业土地制度·····	(92)
四、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农业管理制度·····	(101)
第五章 信仰——农耕文化的价值观念 ·····	(107)
一、神灵信仰：举头三尺有神明·····	(107)
二、政治信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121)
三、道德信仰：忠孝仁义与三纲五常·····	(127)
四、哲学信仰：天道、人道、历史循环论·····	(134)
第六章 农学——农耕文化的智慧结晶 ·····	(143)
一、中国农学著作的分类与分期·····	(143)
二、许行与先秦农家·····	(147)
三、四大农书及其成就·····	(151)
四、通俗的农业理论：农谚·····	(165)
第七章 文艺——农耕文化的理想乐园 ·····	(172)
一、来自远古的遗韵：民间歌谣·····	(172)
二、探究农业的发明者：神话解码·····	(178)
三、农耕文化典型化与神圣化：四大传说·····	(183)
四、剪纸与杂耍：民间艺术·····	(188)
五、都市里的农村风情：山水诗画与园林·····	(193)
第八章 风俗——农耕文化的节庆岁时大观 ·····	(203)
一、农耕与节日的起源·····	(203)
二、主要节日简介·····	(206)

三、婚嫁与饮食	(216)
四、风水与丧葬	(225)
第九章 融通——农耕文化的趋势	(233)
一、农耕文化与工商文化的冲突与联系	(233)
二、中国农耕的现状与对策	(238)
三、农耕文化的走向	(243)
后 记	(247)

第一章 农史——农耕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在中国有着极悠久的历史，从古老的伏羲神农的传说开始，中国便进入了农耕时代。在其后的漫长历史发展道路中，古代农业经历了三代农业的初步发展，秦汉至隋统一前农业经济的繁荣，以及隋唐至明清农业经济重心的南移。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的品种不断丰富，农业生产工具不断翻新，农业技术理论不断成熟，所有这一切都为古代中国成为一个农业大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一、从伏羲到后稷的传说

最初的农业生产，是由渔猎和采集发展而来的。原始人在长期的果实、根茎、枝叶的采集中，逐渐发现果实、根茎有再生的可能，如果能够人工种植，便可以解决奔走之劳和食物不足的问题，正是这种迫切的、现实的、功利的需要孕育了农耕的生机。

当各个分散的部落都得益于农业种植，并在历史中逐渐走向统一之后，人们回首以往的历程，必然对渔猎和农耕的产生有了新的启示。很自然地，他们把这种集体智慧的结晶归之于其部落首领，于是便产生了代表渔猎和农耕的两个传说英雄——伏羲与神农。

伏羲氏的母亲叫华胥，传说中说，一天，她在雷泽中劳动，

发现一个巨大的人体形迹，感到十分惊奇，就用脚去践踏，忽然雷电交加，狂风大作，顷刻间雨过天晴，彩虹飞升，华胥顿觉体内骚动，因感而成孕，生一“人首蛇身”之人，命名为伏羲。这种无夫而孕的传说，是母系氏族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真实反映^①。伏羲氏曾作八卦，造书契，制历法，作琴瑟，定嫁娶之礼，并造干戈，教人结网捕鱼^②，从这些传说中的发明来看，伏羲氏大抵是我国原始渔猎和畜牧业的代表。

传说伏羲氏在位 115 年后病逝，继承其部落首领位置的是神农氏。相传其母安登为少典氏部落首领之妻。炎帝长得也很古怪，相传他“人首牛身”，生后三日即会说话，七日便长齐牙齿，三岁便知耕稼。他曾建都于陈，后迁曲阜，主要活动于黄河下游河南西部、山东东南部一带。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炎帝曾“作五弦琴、作耒耜、教天下种谷、立日历、日中为市、辨水泉甘苦、味尝草木作方书”等。

从这个传说来看，神农氏已知其母为安登，父为少典氏之君，已经不再是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之人。但是，《竹书纪年》却说伏羲在位 115 年后，神农氏即位，根据神农氏知其父及继伏羲氏而立两个前提推测，神农氏大约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的人物，如果这个推测可靠，那么，从传说中可知中国原始农耕与原始畜牧的分工大约在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型时期。据考古研究，母系氏族繁荣于 10000 年前，而约距今 5000 年左右进入父系氏族时期。由此可以推测，中国原始农业大约起源于距今 10000—5000 年之间。

把上述传说材料验之于考古发掘，我们肯定其结论是正确的。例如在山西沁水县下川遗址的旧石器文化层中，发现有春磨

① 郭注：《山海经·海内东经》引《河图》。

② 《竹书纪年》前篇。

谷物的石器：石磨盘、磨锤，它们距今有 10000 年之遥，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加工谷物的石器工具，它的发现证明在 10000 年前已有了谷物的生产，此后，新石器时代前中期遗址都普遍出土小米和农业生产工具（如石铲、石镰、蚌镰等）及粮食加工工具（如石磨盘、磨棒等），从 8000 年前华北平原的磁山，裴李冈文化遗址，到六七千年前开始的黄河中下游仰韶文化遗址，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遗址，到 6000 多年前的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内蒙古地区富河文化遗址，直到 5000 多年前开始的黄河上游的马家窑、齐家、马厂、柳河等文化遗址都大量出土粟和各种农具及谷类加工工具。在 5000 多年前的黄河流域遗址中，又出现大量的大麦、小麦、水稻、高粱等粮食作物。同一时期长江流域各地农业生产也有发现，约 8000 年前，长江洞庭湖畔湖南澧县彭头山一带农业部落，已懂得从野生稻中培育人工稻种。约 7000 年前的长江下游河姆渡人已经培植出了籼稻。以后，水稻就在中国南方繁殖开来。

总之，从古老的传说到科学的考古发掘，我们可以充分相信大约 10000 到 5000 年前的伏羲神农时代是中国农耕事业的发源时期，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奠基时期。而神农氏则是中国农耕文化大厦主持奠基礼的司仪人。

如果说神农氏是中国农耕文化大厦的奠基礼上的司仪人，那么此后活动于华夏大地的各个部落首领，便是这个大厦各支建筑队的队长，他们在各自的范围内完成着这个大厦的局部构造，最终整合成一座雄伟的农耕大厦的殿堂。

分布于今山东西南、河南东北一带的少皞氏部落担任着这个大厦东部的施工任务。传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

玄冥，世不失其职，遂济穷桑。”^①少皞氏为东方嬴姓，其部落联盟有四个部落，他们都经营农业，而且各有所长。重部落善于制作木质耒耜，并把传统的直刺木耒改装成曲柄斜尖，又装上比较锐利的耒头，称为句芒，重后被尊为木正。该部落善于金属加工，制作了薅收之类的工具，加强了中耕除草等农活，称为薅收，该被奉为金正。修和熙合力治水，扩大了对卑湿沃野的垦辟，后世称为玄冥，尊为水正。他们是一个联盟的四个部落，内部之间互相交流，共同发展，形成一个强大的农耕圈，进而带动整个东部地区的发展。

担任农耕大厦北部和西部施工的是烈山氏和共工氏，他们分布于黄河北部太行山麓一带。传说：“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②烈山氏是炎帝之后姜姓部落，其部落首领柱“烈山泽而焚之”，用火耕烧荒的办法，开垦山地，种植谷物和蔬菜，影响很大，后被尊为谷物之神—稷。共工氏也属于姜姓部落群，时代晚于烈山氏，他以善于平治水土著称，推动了众多部落对洪水的斗争，后来禹在治水过程中还联合过共工氏。共工氏在对洪水的斗争中，扩大了耕地面积，繁衍了部落人口，其部落首领也被称为后土，并尊为土地之神—社。

祝融氏是南部建筑施工队的总领，这支部落分布于嵩山东麓的外方地区，同烈山氏一样，他们也采用烈火烧山，再辅以耕作，后世称为火正。祝融氏的活动推动了河南南部地区的发展，其后裔发展到八姓之众，影响极广。

少皞、烈山、共工、祝融各个部落分别在中原地区各自开垦

① 《左传·襄公十九年》。

② 《国语·鲁语》下。

着属于自己的处女地，推动着农业在各自地区的发展，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是为一个农耕大厦而进行局部构建。当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夏、商、周等王朝相继建立后，中原各部落融合成为统一的华夏民族，于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农耕大厦也便宣告落成。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农耕文化走的是多元发展、殊途同归的路子。正由于是多元发展，遍地开花，所以其根植广泛，根系发达；由于是殊途同归，如百川入海，所以根底极厚，基础牢固。因此，中国社会虽随斗转星移而历经沧海桑田似的变化，而农耕文化的基业却始终一脉相承不断发展。

二、夏商周三代农耕的发展

从夏启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到东周的 1600 年的时间里，古代中国实施的是国王专制政体，它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有效地组织奴隶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农业生产因此获得缓慢发展。自春秋以降，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专制政体逐渐走向解体，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内则诸侯争霸，外则四夷交侵。这种政治现象本是经济运动的结果，但这一结果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变化，促进地区经济的繁荣。这是因为统一的中央政权解体之后，新的全国性的政权产生还有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为争夺未来统一政权，必然进行猛烈竞争，而政治的竞争是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因此，分立割据的各诸侯必然着力发展地方经济，从而导致地区经济的繁荣。

此种繁荣首先表现在各个诸侯国。如齐国拥有山东半岛、黄河入海处，兼擅鱼盐之利，富甲天下。齐桓公又用管仲为相，努力发展工商和农业。楚庄王用吴起变法，鼓励垦荒，魏国也用吴起变法，燕国则用乐毅改革，发展农业经济，不过在各国改革中

以秦用商鞅变法最有成效，其经济也后来居上，最为发达。春秋末期吴越诸国也加入争霸行列，长江流域经济也得到初步发展。

其次，表现在山地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农耕化。夏到西周中国社会虽然长期统一，但是统一国家内部经济发展却是不平衡的，所谓夷夏之辨、夷夏之防，实际是文化与经济的分野。专制国家解体后，对于夷人的控制也就进一步放松，处于野蛮状态的夷人走出山林，以其灵活机动的战术和能征善战的素质，进攻并兼并西周时代遗留下来的弱小国家。如楚国就兼并了汉阳诸姬。不过，他们虽然征服了这些弱小国家，但征服者最终被当地先进的文化所征服，他们自己也走上了农耕之路。秦国在春秋初年还不能参与中原盟会，经过长期兼并，到春秋晚期则以中原霸主自称；而楚国在春秋初还自称“我蛮夷也”^①，到战国时代则以中原之中而自居。

这一时期不仅经济区域范围扩大，参与农耕的民族增多，更值得重视的是此时农业水平较传说时期明显提高。夏商时代农业生产主要用木、骨和石器，但已经出现金属工具，到西周时代铁制农具更是广泛运用，这在《诗经》中已有许多例证。春秋到战国则铁器和牛耕已经遍及于黄河、长江、辽河等流域。由于铁制农具的使用，大规模兴修水利便成为可能，于是，李冰在四川成都修建举世闻名的都江堰，西门豹则在魏国破除迷信，治理邺水，孙叔敖在楚国兴修芍陂，郑国在秦国开通郑国渠，关中平原从此不知旱患，亩产一钟。

由夏商自春秋晚期，古代中国社会性质开始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井田制开始走向解体，封建生产关系不断发展，独立的自耕农力量日益壮大，他们五口之家，挟田百亩，在小块的土地上艰苦经营，随着家庭人口的增

^① 《史记·楚世家》。

多，他们不断地垦辟新的土地。政府为增加收入，都鼓励小农家庭分开列户，商鞅、李悝、吴起等都实行过这一政策，人口增殖的压力和政策的鼓励，推动了春秋时代土地的耕垦。此外一些奴隶主为了逃避公田的税收也驱使奴隶开垦荒地。与此相适应，在辽阔的国土上，农业结构也渐趋完善，传统农业中的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林业、副业、渔业都有所发展，五谷六畜都已齐备。

农业生产自身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理论的建设。《尚书·禹贡》分别考察九州土壤、水利和物产。站在统一国家的高度，将全国土壤分为九等，按照土壤与物产的关系制定贡赋政策，是中国古代农业因地制宜思想的源头活水。《礼记·月令》则按月记载天象、气候、物候和农事活动安排，构成中国古代农业因时制宜思想的基础。《吕氏春秋》中的《十二览》和《上农》、《任地》、《辩土》诸篇也是对有关农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农业的发展使得农民成为国家稳定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农业阶层的稳定与否关乎国家命运前途，于是农业政策和农民的生活成为春秋时代思想家们所关心的焦点。儒家提倡仁政、德政和礼治，提出“使民如承大祭”^①，要求统治者节约民力。又提出“不误农时，谷物不可胜食”^②，要求统治者按农业规律办事。他们还坚持认为实行礼治、仁政必须使民“不饥不寒”为基础，故他们所重在民食。墨家代表小生产者和小商业者利益，主张“节用”、“节葬”，反对浪费物质财富，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者和小商业者的稳定，墨家反对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法家主张实行法制，强调以武力统一天下，但是他们认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前提是发展农业生产，管子提出“衣食足而知荣辱，”商鞅则

① 《论语·为政》。

② 《孟子·梁惠王上》。